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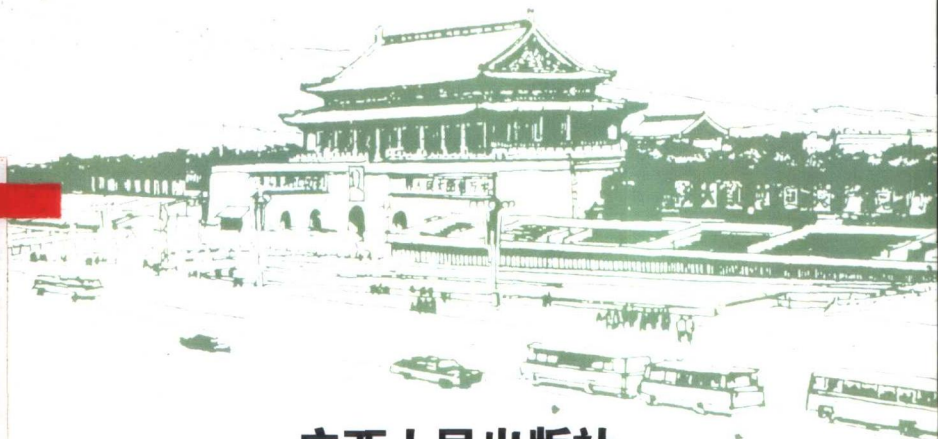
伟人与新中国丛书

鞠躬尽瘁操国事

——周恩来
与新中国



潘晓 孙彦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鞠躬尽瘁操国事

——周恩来与新中国

潘 晓 孙 彦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策 划 区向明 温六零

责任编辑 周 莉

责任校对 李带舅

鞠躬尽瘁操国事

——周恩来与新中国

潘 晓 孙 彦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7.25印张 163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6 000 册

ISBN 7-219-03958-1/K·795

定价:12.00元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开国运筹 经纬初定

——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好总理	(5)
1. 《共同纲领》：奠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	(6)
2. 实事求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16)
3. 独立自主：新中国新的外交形象	(23)

第二章 工业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探索	(35)
1. 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和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	(36)
2.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稳妥可靠的经济决策	(42)
3.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49)
4. 自力更生的落脚点和积极进行国际合作的开放思想	(57)

第三章 春风化雨 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执行者	(64)
1. 感召知识分子的旗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64)
2. 确立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文件：《关于知识分子问	

- 题的报告》 (71)
3. “脱帽加冕”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 (80)

第四章 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石 (89)
1. 日内瓦会议：打开了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道路 (90)
2. 万隆会议：为新中国赢得新朋友的盛会 (98)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石 (109)

第五章 相忍为国 总理本色

- 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到大跃进 (116)
1. 冒进和反冒进 (116)
2. 毛泽东反“反冒进” (123)
3. 从反“反冒进”到大跃进 (128)
4. 调整国民经济 (133)

第六章 一身系新中国安危

- 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137)
1.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抗美援朝，你那里是轴心 (137)
2. 关注新中国的安危和主权完整 (148)
3. 关心和指导人民军队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158)

4. 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是一个软骨动物…… (163)

第七章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 为祖国统一播种、开路…… (171)
1. 我们对台湾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 (171)
2. 把台澎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那就总有一天会回来
…… (178)
3. 蒋介石和我们一样，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190)
4. 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196)

第八章 “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

- 忧党、忧国、忧民的晚年岁月…… (202)
1. “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 (202)
2.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在执行中纠正
其错误…… (209)
3. 为新中国选择新的接班人…… (215)

引 言

周恩来与新中国是一本“实践”之大书。

从历史发展的纵坐标看，1949年至1956年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开篇。这一时期，周恩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政权建设、经济恢复、外交格局的开拓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胜利地实现了开国、建国的伟大目标，为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周恩来充分施展聪明才智，思想解放，心情愉悦，政见迭出，政绩斐然的美好时光，也是共和国的黄金时期。可谓政通人和，万事勃兴。

1957年至1961年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错误地批判了周恩来“反冒进”的正确做法，使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思想主导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实际上退居于“二线”。共和国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开篇的好文章没有按照历史的和理论的逻辑继续谱写新的篇章，出现了新中国发展史上的第一个

马鞍形。这一时期，周恩来处于极度矛盾和痛苦中：一方面是脱离社会实际，违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盲目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另一方面是检讨自己正确的思想和实践，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思想和所谓“变化了的形势”。

第三个时期为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周恩来又被召唤到经济建设和调整工作的第一线，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调整工作，使共和国很快走出了马鞍形的凹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既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间接赞誉，也是对周恩来在严峻困难局面所承担历史重任的注释。这一时期，周恩来尽管精神压力非常大，工作非常辛苦，身心非常劳累，但心情却是愉快的，是身苦心不苦。

1966年至1976年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共和国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陷入全面内乱。周恩来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心情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一方面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另一方面是在执行中纠正各种错误做法，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以减少损失。“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周恩来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无私精神，苦苦支撑将倾之大厦，企图使共和国的运行恢复到正常状态，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在野心家、阴谋家手里，为新中国贡献了最后的智慧和力量。这一时期，周恩来所表现的奋力拼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将与新中国同在。

从思想理论贡献的横坐标看，周恩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作出了独特贡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周恩来是讲得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更是论述最透彻、坚持最坚决的

领导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发展动力，以综合平衡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调控和管理等思想构成了周恩来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今天，我们从中可以领会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先驱者的心智。

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周恩来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论知识分子问题》等论著，无可争辩地成为党在建国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正确理论和实践的代表。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都可以在周恩来那里找到源头活水。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外交思想。新中国及世界外交实践证明，周恩来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为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础。

统一祖国的理论和实践。周恩来以中华民族赤诚之心和伟大政治家的智慧，概括了“一纲四目”统一祖国的思想和模式，为祖国的统一播好了种，开对了路。今天，运筹祖国统一大业仍可从周恩来的思想中吸取政治营养和智慧。

为挫败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周恩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周恩来科学组织，业绩辉煌。他的军事生涯并没有随着国内战争硝烟的消散而结束。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在和平时期同样表现出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军事斗争艺术的稔熟。

新中国历史的发展使周恩来的理论愈发显示出真理的光辉。共和国 50 周年华诞，人民更加思念新中国的开国总理。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实践大书”，需要人们细细研读。这本小册子只是作者对“实践大书”作标题式的概览，有些“标题”可能有遗漏。至于解读是否符合原意，概括是否准确，体

会性的发挥是否得当，有待方家指正。

作 者

1999年1月26日于北京西山

第一章 开国运筹 经纬初定

——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好总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以他湖南乡音，庄严地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①

^①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这两次不寻常的会议和不寻常的决定，使周恩来负起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为此，周恩来贡献了他后半辈子的生命和智慧，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历史的风霜雨雪，甚至地狱般的考验，造就了新中国的辉煌，并为新的历史飞跃奠定了基础。

1. 《共同纲领》：奠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长期企盼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毛泽东早在1940年1月就提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伟大号召。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① 那么这个文明先进的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体描绘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1949年3月23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离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中央所在地、指挥部——西柏坡，于25日早上到达北京城外的清华园车站，当晚到香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26日，周恩来进北京城处理和平解放北平的善后事宜，同民主人士会谈筹建新中国的大政。他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北京城的。

一个代表中华民族新国家、新政府的建立，首先必须取得人民的拥护和认同；这种拥护和认同必须以一定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主张得到反映，才能在民心 and 法理两方面得到建立新国家、新政府的基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撕毁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也就从根本上毁掉了国民党政府在民心和法理两方面的基础，剩下的只有灭亡一条路。

1946年1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后，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由国民党政府主持召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协议。这些协议的通过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对此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1946年3月1日至3月17日）作出了旨在根本上推翻政协通过的各项协议的决定。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认为，“政协决议的通过无异于‘党国自杀’”。“宪草修改原则推翻了总理遗教”。“宪法代表不是‘人民’所选，政协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

蒋介石在4月1日国民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公然说：“政治协商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它“果真成了这样一个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蒋介石这种出尔反尔的政治态度——在政治协商会的闭幕会上他声称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坚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政治立场——根本反对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要求，也不允许建立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这不仅失信于中国人民，

也有悖于世界发展潮流。国民党政府撕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这才是“党国自杀”的行为。

1946年7月3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7次会议单方面作出决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按照政协协议，必须首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现在政府未经改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未能成立的情况下，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理所当然遭到共产党和其他进步民主党派的反对和拒绝。但是，国民党不顾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反对，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违背了政协协议《宪法草案》所确定的民主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总统”即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的国家制度。宪法规定总统拥有至高的权力，不需向任何机关负责。按照宪法规定，行政院实际上成为受总统指挥，为总统个人独裁意志的执行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为新中国建立新政府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历史可能。但是，真正建立人民认同的国家政权，并不是靠武装力量所能解决的。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一进北京城后，立即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建国大事。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着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

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9月间，周恩来拟定了邀请到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77人的名单。为了保证这些民主人士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一再向接待人员电示：一定要把进解放区的爱国民主人士接待好，安全送到目的地。要给他们住好的旅馆，要开欢迎宴会，要买皮大衣、皮帽子、皮靴。10月初，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电报，多方征求各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3日，周恩来提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1949年1月29日，周恩来与毛泽东联名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信的全文是：

“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毛泽东，周恩来。”^①

2月27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审阅修改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文件，并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5月5日，周恩来在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的座谈会上，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道理，并指出这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由十三年来的斗争事实所承认和肯定的。周恩来讲：这几十年来，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43页。

我们很闭塞，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各位在某一方面说来都比我们知道得多。我们共产党人在建设上很差，甚至可说是无知。但我们为什么敢说领导建设呢？第一，政治上局面已经打开，这是建设的先决条件。第二，在建设上我们做一个小学生，向大家学习。第三，我们知道如何推动和组织大家一起前进。大家都长于一样而短于另一样，只要组织起来，就能共同建设。建设还是要依靠各位，希望大家和广大工农结合起来，努力建设新中国！^①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最切实际的阐述。

周恩来所说的政治局面已经打开，解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延续性和必然性。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目标，这为建设强大的富裕的国家创造了前提条件。历史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历史的现实再一次把中国共产党推向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地位。

建设上我们做一个小学生，向大学学习，这既回答了为什么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又解决了如何领导的问题。人们往往以共产党只懂革命，不知道建设的思路，认为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必须有“内行”来领导。周恩来的讲话非常谦虚，认为不懂可以学。在领导过程中学习，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能力。建设和革命一样，都有一个虚心学习的问题，只要好好学习，虚心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通过学习，使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才能有效地实行领导。如果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45页。

中国共产党人不认真学习新的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能力，就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责任。

我们知道如何推动和组织大家一起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领导能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他政治组织、团体和政党都不具备组织人民群众、推动人民群众前进的政治基础和领导能力。他们是长于一样而短于另一样，影响于某一方面而无闻于其他领域。这些政治力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为国家建设做出各自的贡献。

为了新政协会议更好地反映民意，周恩来进一步精心组织各界著名人士来京。6月21日，周恩来又写信给宋庆龄：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后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①

8月28日宋庆龄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再次邀请下，由邓

① 《周恩来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页。